

淄川文史資料集成



淄博市淄川区政协文史委员会编

目 录

我所经历的“南京请愿”

.....孟金山 (1)

“太河惨案”简介

.....文史办 (12)

“太河惨案”亲历记

.....马 著 (18)

“太河惨案”的前前后后

.....刘耀礼 (45)

日寇血洗黄家峪罪行

.....程思远 (64)

刘德培起义

.....程永汝 (71)

忆先父灵泉先生

.....孙和亭 (87)

蒲学研究的奠基人路大荒

.....蒲 雷 (93)

淄川民营煤矿早期开办人张平三

.....张于清 张振江 (105)

华坞煤矿透水事件

.....赵振林 王振声 (110)

渭头河大瓮

.....仇建新 张振江 (124)

淄川商会

.....文史办 (131)

淄川基督教历史

.....孙岐峰 (137)

淄 瓯

.....程永淑 (146)

冲山石匠抗税

.....程永淑 (152)

武林生涯七十年

.....高作霖口述 高兴长整理 (195)

介绍淄川俚曲二首

.....牛国泰 (174)

反动会道门 天明会

.....张兴良 (188)

在贾汪起义的崔振伦将军

.....文史办 (196)

翟超其人

.....程少川 梁立富 (201)

- “还乡团”暴行 张兴良 (209)
- 日伪淄川县公署 李文 (224)
- 聂村剧团 王世喜 (229)
- 西石三教堂怪字楹联释 程永淑 (236)

我所经历的“南京请愿”

孟金山 ①

1931年日本侵略者在沈阳制造了“九·一八”事变，进而占领我东北全境，当局采用退让政策，引起人民公愤。事变那天，我回到济南乡师，这年我二十三岁，学生们抗日呼声很高，研究社会科学的气氛特别浓，我被选为文学研究会负责人，并在出版的刊物上撰文《谈工农民主》。这时从干过国民党改组派的丁锦堂那里传出的消息说，有人到天津去见改组派领袖之一王法勤，请示抗战方针，王说：“没有办法，一切听候中央处置”，从此我对改组派也失望了。受学校进步教师田在村影响的进步学生形成了一个集团，定名为“励志社”，这个组织由干事会

组成，设书记、宣传、组织，当时参加的有一级的刘开俊（潘复生）、张德芳、张洪范，二级的马玉田和我，三级的赵振干，四级的王金堂。参加这个集团的都是拥护共产党的，是学生中的优秀分子。

为了推动抗日，1931年12月初，济南市学联决定赴南京请愿。我在出发前被选为代表团代表，乡师另一个代表叫张洪范。张德芳出发时被任为大队长。关于我参加请愿的动机，在路上对学生们说：“第一是试探一下国民政府对抗日的态度和参观一下他们在南京的建设；第二是了解一下各地和济南学校学生的思想状况；第三是看看津浦路两旁历次军阀混战破坏的状况”。那时南京有命令不让学生去请愿，所以到了车站的第一天没有上去车，12月8日下午才上的车。我们的车将开未开的时候，北平二次请愿学生的列车开到了，两方欢呼、拍手、呼口号，热烈异常。第二天天明到临城，两列火车并排着停到一块了，我下了火车看到他们的火车上

有许多粉笔画的标语，其中有一条是“打倒刮民党！”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个提法。起先“刮”字看不懂，又不是“乱”字，后来想到河南人把“国”字念“刮(Gua)”

“刮民党”就是“国民党”。这标语对我启发很大，这时就在车上领着喊口号，喊的多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被压迫民族解放万岁！”之类，最初学生乱喊乱叫，后来张德芳就不叫别人喊而叫我去领着喊了。我们坐车到蚌埠，国民党中央派人来招待，每人发两个馒头，带了大批传单来，叫学生们静候国府处置，说请愿示威的学生“爱国实足以误国”。到了南京，住在中央大学，用汽车载了一车而包去，学生们不要，送了军毯去，学生们也不要。后来我们检讨了这个问题，认为不要是不对的，因为国民党的东西是民脂民膏，又不是他自己的，我们不用，他们也是用了，你用了这些东西，还可以揭发他的阴谋，有益无害。后来日子多了感觉困难时，我们接受了一部分毯子，也有个别

学校没有路费的，临走时还统一发了路费。剩下部分，后来作了读书会的经费。

在请愿之前，代表们就发生过“请愿”还是“示威”的争论，市学联的本意是打着“请愿”的旗子去，到了那里再示威，认为一开始打“示威”的旗子会去不成。到了南京，代表们犹豫起来了，女生代表态度很硬，刺了我一下，这时我感到在代表团办公室住着没有什么作用，不如和大家住一块好掌握群众。

济南学生到了南京以后，教育厅长何思源就跟着去了。他对蒋介石说：“济南市的学生很老实。”他保证不会出问题，所以蒋介石才敢出来见我们，我们喊着口号去的，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大门里二门外见我们，用扩音器向我们讲话，说得很客气，他说他和济南的同学是有缘的，两次见面都是在敌人日本的炮火下，第一次在“五·三”惨案的时候，第二次就是现在，他说：“你们既反对单独谈判，又要求退出国联，这是矛盾的。”他说：“现

在国家有秦桧，现在的秦桧就是陈友仁^②。他在日本占领东北的时候到日本去，不是卖国贼是什么？我们必须铲除秦桧才能抗日。”那时他和广东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他说你们要求抗日很好，你们回去好好受军事训练，到国家需要抗战的时候，我就亲自率领你们到前线去打敌人。他还说：“国家非到万不得已和有充分把握的时候它是不用战争解决问题的，我不能拿国事当儿戏。”他讲完之后就想走，大家要求按请愿书一条一条的答复，他没有办法就顺着请愿书的条件一条一条地讲，讲了五、六条了，他还不停，我心里急了，我在他讲到“我们不能退出国联”的时候，大声说：“主席，因为个人需要交朋友，国家也需要交朋友；我们参加国联是为了交朋友，你说国联是帝国主义团体还是弱小民族的团体？”他说：“也有帝国主义，也有弱小民族。”我说：“既然有帝国主义，我们为什么和帝国主义交朋友？”这时他生气了，他说：

“×××侮辱元首！”这时我们的总指挥说：“不要乱讲，由代表团说话！”这时学生们都回头看我，看得我很难为情，我没有再说下去，蒋介石便趁这个机会走了。他走了之后，叫邵力子代表他讲话，邵力子讲不出来，大家也不愿听，总指挥就征求大家意见说：“大家认为满意吧？”大家齐声说：“不满意！”他说：“不满意怎么办呢？大家已经累了，我们暂且回去休息，明天再来好不好？”这时没有别的办法，就这样回去了，在回去的路上，大家垂头丧气，我心里很不高兴。刘开俊叫我领着喊口号，我丧气地说：“喊啥？大家要喊拥护蒋主席了！你愿意？”他看了看没办法，也就走开了。

大家回去后纷纷议论，也有主张再示威的，也有不赞成的。我们学校学生们开会，会上我和几个同学主张不但游行示威，而且要破坏他们，如割电线等等。这时于一川也由锦州回来跟去了，他也赞成，于是就推举他和另一个同学去出席代

表团召集的宣传会议，会上他俩把我们的主张提出来了，大家都不同意。女师的一个女学生说：“我同情乡师代表的意见，但事实上很难做到”。于是我们的提议就被打消了，到了示威的那天，只有几个师范学校（一师、女师、乡师）的学生参加，所有中学的学生没有去，到街上喊着口号转了一圈，也就回来了，回来以后，我对济南学生的行动很不满意，用一个纸片很简单的写了几句贴到中央大学的校门旁边。

广州和南京的纠纷很快解决了，汪精卫到了上海，报纸上透露出他对学生运动的意见，说：“爱国实足以误国！”我说“这和蒋介石有什么区别？”但是学生们对他抱幻想的还不少，于是，我得空就偷偷地用粉笔往墙上写“汪精卫能抗日吗？”以引起同学们的注意。这时南京除北平、济南的学生外，上海、苏州和安徽的学生都住在中央大学。就在中央党部开会决定蒋介石下野，孙科当行政院长这

天^③，北平的学生示威了，到了外交部，外交部跑得一个人也没有了，他们把外交部大门的牌子摘下来扛着走；到了中央党部，中央委员们正在开会，他们进去，里面派陈铭枢和蔡元培出来接见，他们把陈铭枢打了一顿，把蔡元培架出好远才被警察夺回去；他们把大门里停着的几辆汽车也砸了，房子的玻璃窗子也砸了。事后组织部的职员用红墨水在一块三角形的白布上写上“共产党万岁！”几个大字抛到院子里，以侮辱示威学生。我记得这是十二月十五日的事，到了十七日这天，上海的学生又示威了。这时上海学生分两派，一派是共产党领导的，一派是改组派领导的。当他们从上海出发的时候，广州和南京的协议还没有成功。所以改组派是愿意到南京去示威的，但到了南京之后，广州和南京的协议成功了，改组派的头子就要上台了，他们就不愿意示威了。但经过激烈的斗争，改组派失败了。最后全上海的学生参加了示威，他们到了中央党部，中央党部早已关上了门，他们

走到《中央日报》社门口，进去砸了。因为《中央日报》曾发表侮辱学生运动的言论，这时卫戍司令部的军警开来，和学生殴打起来，大部分学生也撤退了，一小部分学生被逮捕了。有几个学生因为被截在楼上，从窗口出处跳到秦淮河里淹死了。这时我到街上买东西，正在出事的这条街北端，许多汽车停着不能前进，我从一旁往前走，旁边铺子里的人叫我快藏起来，我问什么事，他们说前面警察打学生。于是，我就回去找同学们商量援助办法，刚到中央大学门口，我校和济南市其他学校的学生出来了，说是去援助，也有徒手的，也有拿棍子的，我到路旁建筑房子的地方拿了一条很长的板条子跟着去了。这时学生们一面走一面喊，我在前西喊了一句“打倒国民政府！”有个育英中学的学生回头看了一眼，他当时认为很惊奇，走了不远，南边放了几枪，学生都往街旁散开了，有的把手里拿的棍子也放了，我和刘开俊避到一条小胡同里，听了听没有事

又要前进，前行的学生回来说过不去，我们也就回去了。这时学生们正在中央大学的门口架起了木栅，检查出入了。当晚济南市的学生认为任务已毕，再住下去没有好事，就决定明天回去了。

第二天清晨起来，军队把中央大学包围了。打着横幅大字标语，排成横列向我们住的地方逼近，我们那里的一条标语是：“如敢故违决以暴徒治罪”于是同学们默默地收拾行李了。进去几个宪兵对我们说：“你们回去吧，因为学生里也有共产党，在这里分不出谁是共产党谁是国民党来！”于是我们就排队走了。走到街上军警还是跟着，我走在最后，跟在我后面的是几个宪兵，我向他们说：“你们有这些势力为什么不止东三省去打日本鬼子呢！”后来，来了一个一师的学生代表，制止我说：“不要和他讲了吧！”讲多了怕我惹出事来。到浦口车站时，一个政治不大开展的同学对我说：“我没想到闹得这样厉害！”

一路上我到处写标语，宣传政府不抵抗和对学生的暴行，也写军警残杀学生的消息。回到济南后，在校秘密组织了读书会，联络进步学生，继续开展社会科学研究。

①本文作者孟金山（1910—1960）中共淄川县委第一任书记（1938.6—1939.12），《南京请愿》选自《淄川党史资料（三）》中的“抗战前回忆片断”。

②陈友仁（1875—1944）出身华侨，早年在英国作律师，1913年回国主编《京报》，1924年后曾任孙中山先生秘书，武汉政府外交部长，“七·一五”后出国。1932年复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因力主抗战又被迫去职。1937年移居香港。1941年遭日寇逮捕，押往上海，1944年在上海病逝，无投降劣迹。

③指1931年10月27日至11月7日宁、粤双方在上海举行的“和平统一会议”。

“太河惨案”简介

文史办

“太河惨案”是国民党反共专家秦启荣指示部下王尚志，在淄川东部山区太河镇，预谋制造的一起伏击我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支队的严重反共事件。

一九三九年三月，坚持清河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八路军山纵三支队，奉山东分局的命令，选派62名干部、战士去鲁南和延安学习。为确保这些同志的安全，支队决定派十团政委罗文华率二、三营护送过胶济铁路至淄川佛村，再抽二营四连三营七连组成护送营约210人，由三营长吕乙亭负责护送到山东分局驻地。这支队伍的总指挥是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

护送部队在卫固镇与去学习同志汇合后，于三月二十七日晚乘夜越过铁路，次日到达淄川以东山区的佛村、井筒住下。

那时，太河为王尚志部占据，为避免发生冲突，先派人与王联系，说明意图，请准假道。征得了他们同意后，三十日早晨，队伍在井筒集合出发，四连在前、七连后卫、中间是受训人员，成一路纵队前进。当队伍行至同古村时，就发现这里驻的王尚志部荷枪实弹，颇有战斗气氛。吕乙亭营长即令部队原地停下，带两连的连长和指导员去见鲍辉，并讲明这次行军的危险性。可惜鲍辉同志认为目前是国共合作抗日，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命令部队继续前进。行进不远，就发现王尚志部的联络人员，传达王尚志命令要我部队沿太河西围墙下通过。

当部队绕过金鸡山，就见太河镇门紧闭，围墙上、山头上站满了持枪的人。吕乙亭令部队拉开距离，加速前进、防止意外。中午，当我部集拢在西围墙外时，在钓鱼台上的王尚志部先开了枪。吕乙亭和鲍辉的通讯员刘书厢当场中弹牺牲。接着，围墙上的顽军也一齐射击，枪声、吼声响成一片，我部队陷入包围之中。这时，鲍